

談香港政治變遷

• 王賡武

一 中英主導下的外部政治變遷

1997年香港最矚目的政治轉變，在其從殖民地主權變為民族主權。將殖民地歸還母國是史無前例的，以往非殖民化一般是為前殖民地的獨立作準備。對香港來說，這從來不是一個合乎實際的選擇。英國在1949年以後仍然留在香港的原因非常複雜，特別是因為冷戰。當時，英國人充當着資本主義陣營的前哨角色。不過，他們縱然有這種意願並獲得反共盟友的支持，但若欠缺有力的政治行動和不能貫徹帶有深刻政治涵意的經濟思想，那也是枉然。只要我們回溯香港在韓戰時期對中國、聯合國以及後來捲入越戰的美國的重要性，便明白英國決定留守香港是有深刻的政治意義的。當然，其對香港人的影響更是深遠廣泛。

英國在1949年以後仍然留在香港，是有深刻的政治意義的。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政府為甚麼願意接受眼皮底下的這種政治姿態？最合理的解釋是北京政府明白到把香港交給英國人管治，中國可以從中獲得龐大的經濟和外交利益。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政府為甚麼願意接受眼皮底下的這種政治姿態？觀察家無不同意，解放軍幾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隨時接收香港，但他們為甚麼沒有這樣做？最合理的解釋是北京政府明白到把香港交給英國人管治，中國可以從中獲得龐大的經濟和外交利益，尤其是英國急欲擴大與中國的商業連繫，或許希望有一天能重拾昔日在華的顯赫地位。因此，英國和中國的微妙關係，使得一種看來不尋常的狀態維持了四十多年。默契是中國不以武力收回香港，英國則不讓香港獨立。

轉變的濫觴實在於越戰結束、中蘇交惡、美國總統尼克松 (Richard Milhous Nixon) 打出「中國牌」、及中國加入聯合國等事件所導致的國際政治環境，其時正值文革後期。因此，當1976年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和其他十年動亂的受難者重掌政權，政治變遷的步伐始得以邁出。鄧小平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措施是關鍵的起始點。然而，我們不應低估經濟改革背後的政治涵意，也不應對這些改革帶來政治後果而感到詫異。

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到了為最後階段作打算的時期。自1982年起，兩國持續協商了兩年多。由於涉及主權問題，故只是兩個主權國間的事務。1984年

在北京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為香港人在中國政府身上所能爭取到的最佳安排。英國能否做得更好，又或者諮詢香港人會否帶來不同結果，這實在很難預料。其時中國握有可觀的談判籌碼，鄧小平深得美國、日本和大多數西歐國家的好感，而且躊躇滿志。雙方協議達成一個為期十三年的過渡時間表是一個特別的決定，讓香港有充裕時間做好變遷的準備。

這當中最大的問題是，中方談判代表或許以為這十三年間一切不會改變，正如中國收回香港後「五十年不變」的政策所揭示那樣。不過政壇上一星期已是很長時間，誤以為香港政治能長時間原封不動是會招來麻煩的。事實上，由於是香港以外（即在北京和倫敦）的政治變遷主宰着這片土地的發展，很多事情是香港無能為力的。如果中英雙方都能開誠布公，貫徹合作精神，那麼《聯合聲明》亦不失為差強人意的起始點。然而，當中英政府之間互不信任，《聯合聲明》就變得無從駕馭。互信的崩壞來自兩個因素，一是不知不覺的，一是突如其來的。不知不覺的因素慢慢浮現，是因為生活在英國法制和管治制度下的香港人質疑中國的行政方式和標準，中國政府則懷疑英國鼓動香港人不信任中國。例如，中國決定在香港東北方的廣東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不久之後就發生切爾諾貝利事件，導致上百萬香港人示威，這是後來天安門事件時同類示威的前奏。1986年這場廣泛的反對活動使許多人大感意外，它顯露了香港人一些以前不為人知的原始政治觸覺。他們從中得到一個深刻教訓，知道在一個缺乏民主的殖民地裏政治自由的重要。

不過，更影響大局的因素是在1989年5、6月天安門事件後的互信驟失。大家應該記得「六四」前兩個周末上百萬人上街示威的場面。但對中英雙方互信關係（《聯合聲明》所仰賴的）破壞最大的，是「六四」後雙方接觸戛然而止。最終結果是把焦點集中在《聯合聲明》的本質，和在許多事情尚未全部議訂的情況下，中國將如何管治香港。1989年夏天是轉捩點，香港被突發的事件弄得人心惶惶，英國不得不引入新措施穩定民心。當年10月，立法局在沒有諮詢中方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了五項政策決定。其中三項是直接與政治有關的，即重新考慮加速民主化的步伐、准許高達25萬香港人擁有居英權資格和引入人權法案。結果，第一項破壞力最低，因為民主選舉的條件最後已有協議，只是稍有改動。但後兩者被看作是公然侮辱北京政府，英國政府對這兩項政策寸步不讓。北京忿然宣布無法接受。這兩個問題自此懸而未決，使兩國政府的互信變得薄弱。

1989至1990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同時，蘇聯集團解體，冷戰結束，全球政局為之丕變，這種種因素對中英關係更具決定性。因為蘇聯突如其來和意想不到的衰落，西方再不需要「中國牌」。西方盟國十年來第一次不再忌憚中國打「蘇聯牌」，可以毫無顧慮地批評中國。反共時代產生的猜疑現在全部用於抨擊中國，針對中國在西方眼中的明顯缺失，特別其對付異見份子的方法。

在此情況下，民主選舉的問題被再度提起。在1989年10月引入五項重要政策的衛奕信總督被認為於民主着力不足。新任總督彭定康把焦點集中在《聯合聲明》中界定含糊的事項上，引進新措施賦予更多市民在新功能組別的投票權。

對中英雙方互信關係破壞最大的，是「六四」後雙方接觸戛然而止。1989年10月，立法局在沒有諮詢中方的情況下單方面宣布了五項政策決定，即重新考慮加速民主化的步伐、准許高達25萬香港人擁有居英權資格和引入人權法案。北京忿然宣布無法接受。

中國對此忍無可忍，堅決不接受這些改變。因此，從彭定康總督所稱的有待進一步商討的提案開始，這些措施就在不顧中方反對的情況下被推行並提交立法局通過為法例。這就是兩國政府政治信任的崩潰，這種情況正是在商議《聯合聲明》的過程中本欲避免發生的。

另一點同樣舉足輕重的是後來香港問題「國際化」，也就是爭取西方國家支持香港的民主政治運動，這在美國國會和一些歐洲議會中取得不錯的成績。這些成功為她們就牽涉更廣的人權問題攻擊中國提供理據。中國對衝着她而來的道德高調大感不滿，視之為攸關她收回香港主權的事情。回想起來，1989年後，外部政治變遷以沛然莫之能禦之勢把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關係推至僵局。中英兩國對於這些變遷的處理說不上很好，這些變數部分是她們自己的作為，但也有很多是她們所不能控制的。

二 香港社會內部的政治轉變

我再談談內部政治轉變。香港人在十年的政治化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聲音，但這並不是說香港人在1980年代以前沒有政治意識。香港人一直對中國政治極之注視。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太平天國參與者避居香港，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還有像王韜這些牽涉其中的人。當然還有孫中山和一些先賢也曾在香港學習現代政治，他們的支持者在二十世紀初在這塊殖民地活動不輟。蔣介石、汪精衛和毛澤東的支持者在1930、1940年代直至1949年共產黨勝利也同樣活躍。我們還要注意，許多當時成立的反殖民地和反帝國主義組織都醞釀着反英情緒，但英國很幸運，一些對她的仇視心態給轉移到當時中國更大的敵人——日本身上。相較起來，作為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盟友的英國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鮮有直接針對她的激烈政治活動。

1949年大陸政權更替時，許多中國人包括左翼支持者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從香港返回解放後的中國，同時卻有許多支持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的人避居香港，有的取道此地輾轉到台灣和美國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出現過數次大陸難民潮，引發難民潮的有經濟謀生和政治因素，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帶來的苦難。

了解大多數香港人是從何而來很重要，因為這表明他們大多數對政治相當敏感，儘管只是對中國大陸的而非香港的政治。雖然在1950和1960年代，殖民地政府對中國政黨活動、學校教科書編纂和中文報刊的政治內容都謹慎控制，但當時香港華人對政治興緻勃勃，這在當時的著作清晰可見。不過，在大部分人心目中，本地政治若非根本不存在，就只是地方事務，並不是他們的民族和愛國情操所要關注的。

香港人何時對香港的政治產生興趣，並沒有一個明晰的分界點。由於獨立無望，所以無法吸引人們投身地方政治活動。而中國發生的事件，像大躍進及其帶來的災難性經濟後果，還有更酷烈的文化大革命，它們太駭人聽聞，以致許多人覺得香港前途黯淡而移民他國。這種用腳投票的方式表現了他們的政治

1950和1960年代，殖民地政府對中國政黨活動、學校教科書編纂和中文報刊的政治內容都謹慎控制，但當時香港華人對政治興緻勃勃，只是對中國大陸的而非香港的政治。也許可以說，1970年代受教育、對文革反感的新一代，和許多剛逃離中國的人，是首批投身香港政治未來的人。

決定。也許可以說，1970年代受教育、對文革反感的新一代，和許多剛逃離中國的人，是首批投身香港政治未來的人。

但這還說不上是本地政治人格面貌的出現，反而應視之為香港人的新認同感，我想不出這個時期有甚麼團體可以代表這種新政治。這種對政治的新興趣可見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它們分別對應1970年代初的兩件事件。第一是當時很多組織爭取把廣東話列為與英文地位平等的官方語言，遂掀起了一場地方政治運動；第二是「保衛釣魚台運動」，這是一場激發更多人愛國心的海外移民政治活動，目的是拒斥日本聲稱擁有南中國海一個受爭議列島的主權。前者帶着民族主義色彩，但主張廣東話而非普通話（中國國語），顯示了忠於和認同對象的差別，並表達一種獨立於民族政治之外的狀態，這與以前的反殖民示威不同。而後者帶出了愛國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緊張關係，一種渴望做中國人，但又想生活在殖民地而非共產制度統治下的心態。

因為鄧小平的改革政策，香港經濟蓬勃發展，隨之給予香港人在政治上表現自己為香港華人的機會。中英談判為未來政治打開了一個新窗口。香港人對它們反應強烈但分歧，但逐漸無奈地明白到香港人並沒有置喙的餘地。談判桌並沒有香港代表的位子，主權問題表明未來是由兩國政府決定。儘管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意氣風發到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但越來越多香港人千方百計的想移民。1985至1994年間，香港人每年移民的數目約4至6萬之譜。有些人是為了經濟原因，但大部分是出於政治考慮。

雖然如此，覺醒開始了。前面提到1986年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引發的抗議，此事之後隨之出現更多爭取民主的呼聲，並要求加快實行立法局全民直選。各色各樣針對特定問題的壓力團體紛紛成立，成員大部分來自中產階級。各行業公會（特別是教師協會）均有自己的發言人，但大體上整個社會是分歧的。一方面是積極份子和消極份子的矛盾，一方面是那些歡迎香港回歸中國、支持中國根據《基本法》制定未來法規的人，和那些對鄧小平提出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構想沒有信心而要求更多保障的人之間意見相左。理論上，似乎無人不支持民主，但邁向民主速度的快慢，以及如何確保特區政府向本地立法機關負責而非聽命中國當局，則惹人爭論。但與此同時，新政客很快曉得怎樣和選民打交道，叫人刮目相看。這表明人民已經成熟，有條件實行民主政治。

1989年以前，中英雙方談判代表圍限着民主的步伐。天安門事件後，這個問題又再在各個中英關係間揮之不去。雖然政治轉變的步伐仍舊循序漸進，但英美兩國的對華姿態卻提高了，因而也刺激了本地政治活動興起。民主黨的成立意義重大，因為它比其他團體得到更多基層支持，自由黨和其他小政黨（部分是從早期論政團體演變過來）接着成立。及至1991年選舉時，香港政壇和其他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前的景象並無二致。這大概是1982至1984年談判時不曾預計的，沒有人料到情況會這樣複雜。當中最棘手的是希望那些民選議員能坐「直通車」，在1997年政權移交後繼續留任。

民主黨的成功是對中英兩國政府的挑戰。這種政治情況的改變警告中國1997年後在控制香港發展時將遇到困難，也提醒英國要更加注意一個他們直至當時還一直試圖低調處理的問題。主權移交在即，沒有多少時間可供試驗。

1986年中國政府決定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引發了上百萬港人的抗議。此後，出現更多爭取民主的呼聲，並要求加快實行立法局全民直選。理論上，無人不支持民主，但邁向民主速度的快慢以及如何確保特區政府向本地立法機關負責而非聽命中國當局，則惹人爭論。

對香港來說，應付政治變遷向來是不容易的，因為其中牽涉到中英雙方的龐大利益。不過，香港人若要應付香港的政治變遷，就必須把他們的才幹轉化為形塑他們期望的在中國主權架構下的自治方式。看來，處變之道才剛剛開始。

民主派敦促英國為他們多盡點力，而1992年新任港督開始為他們兵行險着。結果可想而知，中國全面拒絕。

對香港來說，應付政治變遷向來是不容易的。中英雙方都知道在任何一份協議中的每一個字眼、用詞、句子和文章都暗伏陷阱。談判期間，英國外交伎倆和強大政治籌碼相周旋。龐大的利害關係牽涉在內，因為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和統一台灣大業來說，賭注太高了，英國成功利用優勢讓自己拿了一手好牌。但大家早就知道，如果要成功履行協議，到最後，互信和持續的折衝尊俎是往後十三年不可或缺的，但1989年6月4日的事件卻最終令雙方錯失機會。

英國希望透過向聯合國提交一份有約束力的協議來應付變遷。中國則希望拉攏重要地方領袖，並把《基本法》中的一些敏感事項正式定案，以此來方便主權順利移交。雙方在未知領域中探索，竭力為自身的位置爭取最大利益。雙方談判代表都惟恐沒有為捍衛國家利益克盡己職。但出人意料的國際事件和地方壓力暴露了他們達成的協議的瑕疵。

那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際政治覺醒的香港人，可能認為迄今沒有誰是勝利者。短期來說，他們是沒錯的。但政治期望轉變的步伐叫人矚目。而且，有些政客成就非常出色，這包括親中國的以及那些為他們的理想爭取國際視聽的人。不過，若要應付香港的政治變遷，他們必須把這些才幹轉化為形塑他們期望的在中國主權架構下的自治方式。看來，處變之道才剛剛開始。

三 香港在世界歷史中的遠景

現在讓我談談香港在世界歷史中的遠景。香港回歸中國是否意味西方在亞洲宰制地位的終結，還是亞洲只不過是復歸常態？在移交前夕舉世注目之際，叫人禁不住懷疑這是否在歷史上劃上一個轉折點。如果我們能穿越時空去看看，未來是否會回到西方列強東來前的情景？如果是，亞洲將會回到怎樣的過去裏？自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以來，亞洲地圖歷經幾許轉變？

今天，中國和日本的疆界和十七八世紀時沒有太大分別。韓國現在一分為二，但當她重歸統一後，將有截然不同的光明前景。東南亞五個大陸國家改變甚小，雖然陸上疆界有所調整，但不像以前那樣動輒惹起爭端。然而，原來恆河沙數的近海和沿河王國，和群島的自治港市改變極大，它們現在成為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國。只剩下新加坡和汶萊教人想起昔日港市的獨立傳統。

在南亞，當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沿海時，莫臥兒統治者在印度北部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雖然他們在南部面臨挑戰，但仍能在北部勉力使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跟他們和平共處，這在今天看來幾近不可能。後來統治印度的英國人最終無法彌補各宗教間的鴻溝，因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種下衝突的禍根，至今仍看不出解決的希望。

總而言之，1511年亞洲的政治面貌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辨。每一個國家仍然留傳着人民熱情認同和忠於的傳統。但自西方人東來以後，經濟和政治基礎是

否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而令史家可斷言西方人改變了亞洲的面貌？今天，這種帝國遺產有那些部分值得我們注意？

四個曾統治亞洲大陸大片土地的西方國家，即英國、美國（英國的實際繼任者）、法國和荷蘭，她們繼承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的目標，這提醒我們第一批西方人東來的目的，他們宣稱是為尋找「基督徒和黃金」而來。這種在今天看來不加掩飾的心態，仍然留在後來其他列強擴張的骨子裏，只不過其後是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的重點出現。

亞洲人對西方的回應，隨着時地的不同而差異甚大。比如，日本向西方開放門戶而得以富國。在菲律賓，同樣的開放使她變為基督教國家。在其他地方，因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世俗理想，把結果領向另一個極端——關上迎接西方的大門。同樣有意思的是，原來「基督徒和黃金」的想法隨着世界改變而以不同方式重新定義。

從前，黃金成為財富的象徵，但在過去兩個世紀，財富之源則來自現代科學所推動的工商業發展，這創造了新的象徵。

日本是亞洲的典範。她以造船和軍火工業起家，之後發展其他工業賺取更多財富，而又把所得大量投資在國民科技訓練上，以求把產品質素精益求精。結果，日本逐漸在各種精密工程技術上挑戰西方工業力量。日本的成就驕人，本世紀之交便與西方分庭抗禮。近期，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小龍亦追隨日本老路，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相信很快也會依着同一路子走。

資本主義的成功對比起社會主義的失敗，確切傳達了一個信息——以新形象出現的「黃金」是關鍵，這幾乎是每個人都能學習並成就的。但是，基督徒（或者另一個神）的問題卻顯得模糊了。它究竟意味着甚麼，西方自己也不大清楚。以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主張在傳教與黃金之間取得平衡，但荷蘭人和英國人將這個信念拋諸腦後，全力追求黃金。法國人似乎曾遵循過原本的信念，但最終更熱衷於科學和資本主義的黃金。只有美國人看來公然區分兩個目標，其做法是把他們的神世俗化，並把十八世紀「基督徒」的理想變成一種前所未有的信仰，因此出現了自由貿易和民主、法治與個人權利的混合物，竭力使它成為一種新宗教，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至善。但是，亞洲領導人、商人、政客和知識份子卻感到迷惑。許多人現在問：美國那種「基督徒與黃金」二為一體的形象能維持多久？

也許就西方對亞洲的影響蓋棺定論，現在為時尚早。如果亞洲傳統產生了恆久的改變，亞洲將在二十一世紀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一個亞洲版的「基督徒與黃金」可能仍然是檢驗標準。從香港的前景（也將見於越來越多的地方）觀之，答案可能最終歸結為「你們現代科技的黃金比你們的世俗之神更奪目耀眼」。

亞洲的未來繫於兩個因素：一方面是當亞洲人把現代文化價值收為己用之後，如何重新定義原本的一套準則；一方面是期望提高生活標準。如果現在所說的黃金是由亞洲創造、並由亞洲人重新分配的財富，那是沒有甚麼爭論。掌握高科技以確保國家財富持續增長，是大多數國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如果進步

如果亞洲傳統產生了恆久的改變，亞洲將在二十一世紀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一個亞洲版的「基督徒與黃金」可能仍然是檢驗標準。從香港的前景觀之，答案可能最終歸結為「你們現代科技的黃金比你們的世俗之神更奪目耀眼」。

西方在亞洲取得的黃金是否能抵消或減低其對改變別國制度的渴望尚未可知，但香港回歸中國，肯定為這場緊湊的棋局走出一隻影響大局的卒子。主權和自由之爭將繼續成為棘手的問題，而舌劍唇槍的局面也不會中止。現在，是思考西方在亞洲宰制地位結束的意義時候了。

的終點只有一個，而所有國際關係和互相依賴的國際機制的運作都趨向這一終點，那市場競爭將可一直和平進行，擺脫以往各國間你爭我奪的景況。

但將「基督徒」作為一種優越文化的象徵（特別是世俗民族文化）卻是另一回事。今天的現代價值比之1511年面對亞洲傳統價值時，顯然已非吳下阿蒙。當年，內容豐富和強勢的儒家思想正如日中天，今天卻已被邊緣化為倫理和家庭價值的一環。如果中國重拾亞洲強國的地位，其人民和鄰國會不會把儒家思想改頭換面以用於當世？大多數中國人不以為然，充其量是很渺茫，不過，本世紀他們急於求變，碰了不少釘子，更聰明的中國人或許會以更長遠的目光視之。

基督教在西方已不再成為問題，但宗教在亞洲仍然舉足輕重。當伊斯蘭教在南亞勢力強大之時，它與印度教相安無事，和佛教和平共存。自那時起，伊斯蘭在東南亞諸島國有長足發展。信奉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曾有出現新的緊張關係（現在這包括信奉基督教的菲律賓在內），但今天新的「黃金」不虞匱乏，創造世俗財富的新模型業已出現，卻沒有冠上像「基督徒」、「回教徒」、「儒家」或任何形式的標籤。此外，隨着印度教復興和佛教國家堅定自強，各國重回穩定共存的局面現在再次可行。

五百年前西方來到亞洲尋找「基督徒」的信念，現在已轉化為一種夢想，即企圖使全世界最終都奉行他們的現代世俗理想。他們似乎無意干涉亞洲宗教繼續留傳，或許還樂於讓南亞和東南亞保持現狀。只有東亞的前儒家世界，他們仍然希望根本改變之，此中的原因很複雜。西方在日本的成功令他們期望能在韓國和中國重施故技。在中國和北韓遺留的列寧主義不容於他們，是他們眼中威脅安全的挑戰。美國教化中國「異教徒」的天職（近乎某種妄執）仍未竟全功。在亞洲取得的黃金是否能抵消或減低其對改變別國制度的渴望，尚未可知。雙方看來都為長遠發展作打算，亞洲的未來將取決於西太平洋緣區到底是戰爭還是和平。

香港回歸中國為這場緊湊的棋局走出一隻影響大局的卒子。中央雙方都押下高注碼，看似都有致勝的把握。主權和自由之爭將繼續成為棘手的問題，而舌劍唇槍的局面也不會中止。但長遠來說，這只是以遠大目光和審慎態度思考問題的一個暫時休止。現在，是思考西方在亞洲宰制地位結束的意義時候了，但我的重點將放在亞洲邁向新的常態這條更漫長的道路，而現代西方遺產已成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林立偉 譯

王慶武 曾任馬來亞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澳洲國立大學遠東歷史講座教授、香港大學校長等職位。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主要著作有：*The Nanhai Trade* (1958)；*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1963)；*Community and Nation* (1981)；*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1991)；《東南亞與華人》(1987)；《歷史的功能》(1990)等。